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与历史经验研究

——基于田野育人的视角

章艳涛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是田野育人的重要内容。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农民问题就备受关注和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和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执政的重要根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形成了一条线索分明的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图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至今),从基本历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和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田野育人;马克思主义;农村;基本历程;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05-0136-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05.04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说过:“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农民问题就备受关注和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到了农民的支持与参与。“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来时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弘扬“红船精神”,胸怀千秋伟业,深知“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才能流长”,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和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执政的重要根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形成了一条线索分明的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图景。基于田野育人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与历史经验,对于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和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不仅要从小义的角度来考察,也要从微观的特定意义角度来挖掘,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和历史经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是同向同行的,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阶段,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至今)。

(一)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

键词是“革命”,有两个重要的群体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人,有三个关键的转折事件是党的“三大”“二七惨案”“秋收起义”,有四个重要的分阶段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架起了马克思主义通往中国农村大地的桥梁,李大钊是较早觉悟到农民力量的革命先驱之一,他在《晨报》发表题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提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这位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向青年人传达了发自肺腑的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李大钊实际上是向青年和知识分子提出了进入农村,启发农民觉悟,运用农民的力量来实现变革中国的思路。在中共成立后到二大召开前的一年里,党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工作的重心在城市,由于认识的局限,对农民问题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但有一些党员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比如1921年9月27日,在李成虎等人的领导下,在萧山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这是中共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一次有益尝试。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但总的来说,中共“三大”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度是不够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坦承:“我们很少关注农民运动”。中共“三大”宣言将工人和农民相提并论,并且形成了专门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表明广大农民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动员对象。“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呼吁要联合强大的同盟军——农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

收稿日期:2024-7-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思政课改革创新‘田野’视角”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GXSZ049YB);“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经验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S119X23020)。

作者简介: 章艳涛(1989—),女,浙江兰溪人,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思政教育研究。

书》中明确提到要联合农民,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

大革命时期(1924—1927),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主要以“思想启蒙”为目的,以兴办乡村教育为依托,以开展农民运动为契机,以唤起农民为追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展开农民运动起步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身份进入农村,他们在乡村办教育,把李大钊等人“向农村去”的呼吁具体化了,就是为了启蒙农民的思想,唤醒农民的觉悟,造就社会变革的生力军。例如,恽代英等人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以此作为亲近农民的手段,倡导青年人要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民疾苦,教育农民为解除自己的枷锁而奋斗。面对强大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土地问题和租税问题这两个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是农民最为关心的两大问题,利用国共合作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有了新的契机,即农民运动,中共把上述两大问题作为突破口,提出了符合斗争形势发展的主张:“限田”“限租”。倡导开展“农民运动讲习所”,设置“革命理论”“军事训练”“农村实习”等三方面的课程,提高农民的觉悟和实际能力,培养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这一时期,农民讲习所在广州共举办了六届,担任主任的都是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教员多为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一些重要干部。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主要以“土地政策”为导向,以建立根据地为依托,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内容。国民大革命沉痛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加强共产党人自身的理论素养并且联合为数最多的农民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不仅仅是一项极为必要的工作,面对文化层次低、观念较为落后的农民,这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具体表现在理论和实践齐头并进,理论上,共产党人通过兴办夜校、识字班等各类学校,创办《红旗》《党的建设》等各类杂志,创新歌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制定口号、标语等简语标识等宣传党的理论指南和革命主张,其他诸如农村的姓氏宗族集会、庙会、赶集场所等,都成为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的场所,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实践上,共产党人深知土地对于农民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逐步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使得他们发自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这一时期因受到教条主义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比如,对于从苏联直接引用过来的“苏维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和辨析,农民理解不了这个制度的具体内容,甚至有不少农民误以为“苏维埃”是具体的个人。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主要以“抗日战争”为主题,以“政治动员”为重点,以劳动生产为动力,以文艺创作为保障。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维系力量更加稳固了,传播手段更加多元了,关注重点更加聚焦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紧扣抗日这一主题,实行抗战教育,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并且“根据抗战形势和农民群众的需要,使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生产服务”。在表现形式方面,延安民间文艺活动尤其具有创造性,戏剧、评书、相声、秧歌舞等在当地备受欢迎,这些民间文艺形式虽然没有直接引用马列主义慷慨激昂的语句,但是其内容和价值取向在无形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塑造着农民的价值观念,改变着农民的知识结构,引导着农民的实际行动。在维系力量方面,共产党人注重在传播内容、传播规范等方面下功夫。在内容上,选择和创造容易使农民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的作品来加强教育效果,这些作品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反映真实生活为题材的。在传播手段方面,充分利用黑板报、墙报等来普及和宣传相关的时事报道、革命理论等,以此提升农民的政治和文化素质,达到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目的。在关注重点方面,共产党人注意到若只注重理论宣传,漠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吓跑群众,只有真正地关注民生,关注农民的吃喝穿用和生老病死等,才能赢得农民。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主要以继承发展为思路,以制度规范为关键,以服务群众为动力,以“土地改革”为要地。这一时期,尽管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但是依然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抗日战争时期有效的措施与做法,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宣传。诸如冬学、民校、识字班等抗战时期的群众教育形式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坚持和发展,明显的不同就是教育和宣传的规模更大了,范围更广了,制度更规范了。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真理,但单凭其自身并不能实现在农村的传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目的地推进,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民最关心、最关注的核心,党始终以服务群众为动力,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受益,还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翻身做主,梁漱溟在参观解放区土改后说:“工作中虽不免有些小错误,进退失宜,然使我领会共产党着眼不在分田土,而在农民树起脊梁,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意义甚深。”土地改革运动真正地改变了农民的命运,他们更加相信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也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与提升。

(二)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是“建设”,有三个重要的分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7)。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发展工业等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为指导,以苏联为借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道路。针对农民的思想状况和实际水平,主要采用村小组集会、农民座谈会、农村黑板报、广播等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主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使农民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此外,利用合作化的契机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扬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实践中自觉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都急于求成,过分强调了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忽视客观经济的作用,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进程。

(三)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至今)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以“改革”和“发展”为关键词。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改革的深化,新农村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民不仅成了土地的劳动者,还成了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意识得到高度的发展与张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为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思想阵地提供了保障。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内容上与时俱进,形式上多种多样,做到三个结合,理论灌输与思想疏导相结合、普遍教育与典型示范相结合,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结合,为农村改革与发展提供保障,维护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和统一。

首先,理论宣传与解放思想相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树立,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也回到了正轨,特别是在农业政策理论的宣传普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包括宣传农村扶贫政策、农村土地政策、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等。上述政策都是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理论政策宣传一方面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增强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21世纪以来,国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解放农民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其次,普遍教育与典型示范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是,受传统历史的影响,小农思想仍然在农村地区残存。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农村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逐年减小。1991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中,把开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确定为四项重点教育内容之一。21世纪以来,国家依然高度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积极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农村基础文化设施的投入,让农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最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结合。改革和发展的转型期带来了农村新旧问题的交织冲撞,导致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与国家发展的大环境还有很多不相适应之处。部分农民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比较模糊,导致集体观念淡化、享乐主义滋长、陈规陋习泛起等现象层出叠见,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以适时推进农村政策为抓手,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巩固党在农村事业建设的领导地位。例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以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二、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史经验——基于田野育人的视角

(一)从历史发展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接续奋斗是马克思主义在农

村传播的根本保证。从前文对“传播”一词的广义理解来看,“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人与农民,从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来看,加强党的领导始终是最根本的政治保障。建党初期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豪绅,主要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民强化了有组织、有目的、有主题的教育活动,主要是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和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赋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使农民获得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良好的环境和根基。百年征程,栉风沐雨,阔步向前,中华大地历经沧桑巨变,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传递好手中的“接力棒”,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和特征,营造适宜的环境与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二)从农民主体性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要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活力,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的问题,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百年中国,是人民书写了历史,而历史也将人民放在了最中心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在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之后,共产党人又争取机会、创造机会让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建设中,目的是通过让农民广泛参与,一方面可以释放他们的首创精神,让农民群众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一方面,鼓励最大多数的农民参与社会治理中,能够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主人翁的地位,享受社会治理建设带来的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体会到作为主角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要始终顺应农民期待,准确解读经典著作,坚持不懈做好理论通俗化工作。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是社会高度文明的精神产物,其话语体系和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方式不易被我们所接受,它所阐发的共产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哲学理论对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来说很难把握,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但是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农村顺利传播,就要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将经典著作寓于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中,在如何做好理论通俗化工作上下功夫,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提供直接保障。

(三)从唯物辩证法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史经验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相对性、批判性、革命性的特点,其核心唯物辩证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恩格斯指出,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统一性原理”“联系的普遍性原理”“发展的普遍性原理”等哲学原理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问题,或许

会对凝练其中的历史经验有一定的解疑释惑之效验。

坚持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基本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要在农村得以传播必须要科学、正确地认识马克思物质统一性原理,尊重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利用好实践这一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途径,在农村特有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话深刻地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只有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若是违背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只会呈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具有联系性和整体性。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是主体合目的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相互联系、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历程就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联系的,各个阶段的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并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前提下实现了各个阶段的过渡与跨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也是维系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情感命脉、不懈动力和联结不同年代中国人的使命和担当。

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具有发展性和动态性。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普遍性的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现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

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存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之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从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紧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及时总结党领导农民创造的经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等重大问题,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升华,增强理论传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5).
- [2]荣玉巧,王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基于华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J].长春大学学报,2023,33(7):83-88.
- [3]张桂华.马克思主义在京郊农村的传播探究——以京郊大瓦窑党支部的建立为例[J].马克思主义学刊,2022,10(1):79-86.
- [4]徐建飞.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7-103.
- [5]肖芳.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1.
- [6]肖芳,聂家华,周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与经验[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04-109,112.
- [7]李子康.抗日老根据地教育工作回忆片断[J].山西教育科研通讯,1982(2):35-36.
- [8]权玉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2.
- [9]李承志.在跨文化更替与传播之间——梁漱溟跨文化传播思想探赜[J].临沂大学学报,2023,45(4):132-140.
- [10]王双印.新中国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J].长江论坛,2014(6):3-8.

A Study on the Basic Proces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Education

ZHANG Yan-tao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turbulent red chap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ield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issue of farmer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 CPC has always regard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rural area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farmers 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With the 100-year history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with the tenacity of “sticking to the green mountains and not relaxing”, a clear clue of the basic course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formed.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1921—1949),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1949—1978), and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1978—present).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basic proces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tart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journey and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field education; Marxism; rural areas; basic process; 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杨雨青)